

Abstract of Dissertation entitled

**On the Patriotic Behaviour of Hong Kong Chinese during 1919–1926**

**論 1919 至 1926 年間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

Submitted by

Tsang Kar Ming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July 2018

This dissertation constitutes an examination on the patriotic behavior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during 1919 to 1926. The dissertation will discuss how political events taking place in China, such as the May Fourth Incident and the May Thirtieth Incident, stimulated the patriotic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in Hong Kong, and will analyse their patriotic behavior.

During 1919 to 1926, the patriotic behavior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was mainly due to responding to the patriotic event in mainland China, such as the May Fourth Incident in 1919 and the May Thirtieth Incident in 1925. Besides, the changing political climate in mainland China, particularly the co-operation of the Kuomintang of China (or the National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d much impact on the patriotic behavior of Hong Kong Chinese.

This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seven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defines the scope of the dissertation.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the May Fourth Incident in China and the co-operation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third chapter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The fourth chapter investigates the patriotic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in Hong Kong responding to the May Fourth Incident. The fifth chapter explores the patriotic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in Hong Kong in Canton-Hong Kong Strike. The sixth chapter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patriotic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in Hong Kong during 1919 to 1926. The last chapter concludes the dissertation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riotic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in Hong Kong.

262 words

**On the Patriotic Behaviour of Hong Kong Chinese during 1919–1926**

**論 1919 至 1926 年間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

by

Tsang Kar Ming

M.A, *H.K*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uly 2018



### **Declaration**

I declare that this dissertation represents my own work,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ement is made, and that it has not been previously included in a thesis dissertation or report submitted to this university or to any other institution for a degree, diploma or other qualifications.



Signed: \_\_\_\_\_

Tsang Kar Ming

## **Acknowledgements**

I thank in particular my Supervisor, Professor Gilbert Chan Fook-lam, for his valuable advice and comments on my dissertation. I am also grateful for the advice and guidance on study of history given by all the teachers during and after the classes of this M.A. course.

## 目錄

<b>第一章 導言</b>	
1.1 研究範圍	第 1 頁
1.2. 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及香港華人的愛國思想	第 2 頁
<b>第二章 從「五四事件」到「國共合作」</b>	
2.1. 「五四事件」與愛國思潮	第 5 頁
2.2 中國共產黨與反帝國主義思想	第 6 頁
2.3 孫中山與民族主義思想	第 8 頁
2.4 「國共合作」	第 9 頁
2.5 小結	第 10 頁
<b>第三章 香港社會中的華人與政府</b>	
3.1 香港社會與華人社群	第 12 頁
3.2 香港殖民地政府對華人的管治	第 13 頁
3.3 香港殖民地政府對華人愛國行為的處理	第 15 頁
3.4 小結	第 17 頁
<b>第四章 「五四事件」與香港華人愛國行為</b>	
4.1 香港華人與「五四事件」	第 18 頁
4.2 《華字日報》對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的報導	第 18 頁
4.3 時人對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的回憶	第 21 頁
4.4 香港華人響應「五四事件」的愛國行為	第 23 頁
4.5 小結	第 24 頁
<b>第五章 「省港大罷工」與香港華人愛國行為</b>	
5.1 省港大罷工前的罷工行動與香港華人愛國行為	第 25 頁
5.2 省港大罷工的起因	第 27 頁

5.3	省港大罷工初期情況	第 29 頁
5.4	省港大罷工方向上的轉折及結束	第 32 頁
5.5	省港大罷工的香港華人愛國行為	第 34 頁
5.6	小結	第 35 頁
<b>第六章 1919 至 1926 年間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的分析</b>		
6.1	香港華人愛國行為與中國愛國事件	第 36 頁
6.2	香港華人愛國行為與國共兩黨	第 37 頁
6.3	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的組織性	第 38 頁
6.4	香港華人愛國行為與華人精英	第 40 頁
6.5	小結	第 41 頁
<b>第七章 總結</b>		第 42 頁
<b>參考書目</b>		第 44 頁

# 第一章 導言

## 1.1 研究範圍

本文旨在探討 1919 至 1926 年期間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本文將 1919 年定為研究的起端，而以 1926 年為止。1919 年正是北京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發生的一年，而香港亦發生了響應北京學生運動的愛國行為。至於 1926 年則是省港大罷工結束的一年，省港大罷工是 1920 年代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的一個高潮。要探討 1919 至 1926 年期間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需要明瞭當時外在的中國政治環境，包括愛國主義及反帝國主義在中國興起的背景。此外，我們也需要了解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其華人社會的特殊性，包括它的華人社群及香港政府對它的管治。

本文主要集中討論兩件重大歷史事件所激發出來的愛國行為，包括 1919 年北京發生學生運動後香港華人響應該運動的愛國行為，及 1925 至 1926 年因抗議上海五卅慘案而發生的省港大罷工。本文會對這些事件的經過作說明，並對事件當中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作分析。

本文將五四運動作為「事件」的角度來研究，以狹義的角度將它視為學生示威運動，或稱為「五四事件」，而並非廣義的「五四運動」。後者包括一個整體跨越多年的新文化運動，及五四學生愛國運動。<sup>1</sup>對於廣義的五四運動，依據學者周策縱的觀點，主要事件發生在 1917 到 1921 之間，<sup>2</sup>他對廣義的五四運動的定義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工罷市、抵制日貨運動，以及新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這連串的活動都是由下列兩個因素激發出來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條要求和山東決議案所燃起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是知識分子提倡學習西洋文明。並希望能依科學和民主來

---

1 關於狹義及廣義的五四運動的定義，參看周策縱著，楊默夫譯：《五四運動史》（台北：龍田出版社，1980 年），頁 1。

2 周策縱著，楊默夫譯：《五四運動史》，頁 1。

對中國傳統重新估價，以建設一個新中國」。<sup>3</sup>由於 1915 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1919 年凡爾賽和會作出了山東決議案激起了中國民眾的愛國心及反抗列強的情緒，中國學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領袖得到了群眾情緒的支持，發起了一連串的抗日活動，和一項大型的現代化運動，希望通過思想改革及社會改革來建設一個新中國。他們著重西方的科學及民主觀念。<sup>4</sup>至於中國的倫理教條、風俗習慣、文學、歷史、哲學、宗教，及社會和政治制度均受猛烈攻擊，而攻擊的動力多是從西方的自由主義、實驗主義、功利主義、無政府主義及各樣的社會主義思想而來。<sup>5</sup>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發生的學生示威運動是整個廣義「五四運動」的漩渦，是風暴的中心。<sup>6</sup>由於本文是探討愛國主義方面的問題，本文會研究狹義的「五四事件」，即 1919 年 5 月 4 日的北京學生示威運動，<sup>7</sup>而不會討論廣義的「五四運動」。因此，本文會探討香港華人在五四事件發生後，所作出的愛國行為的內容及性質，但不會討論新文化運動的性質及它對香港的影響。

在討論香港華人在 1925 至 1926 年發生的省港大罷工的愛國行為時，本文會探討省港大罷工的發生與中國國內的五卅運動的關係，及與當時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的合作的背景。本文重點是集中在省港大罷工在政治上與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發生的關連。

## 1.2. 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及香港華人的愛國思想

愛國主義（Patriotism）及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分別引起學術上的不少討論。<sup>8</sup>本文不會對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作深入的學術探討，只會簡略說明兩者

---

3 周策縱著，楊默夫譯：《五四運動史》，頁 5-6。

4 周策縱著，楊默夫譯：《五四運動史》，頁 1。

5 周策縱著，楊默夫譯：《五四運動史》，頁 1。

6 周策縱著，楊默夫譯：《五四運動史》，頁 133。

7 周策縱著，楊默夫譯：《五四運動史》，頁 2。

8 有關愛國主義（Patriotism）及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之間的異同，可參看羅志平：《民族主義與當代社會：民族主義研究論文集》（台北：獨立作家，2016 年），頁 191-197。



之間的關係及異同。

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很多時候是交替地使用，兩詞彙均暗示對國家的情感，對國家或人民的福祉有一種特別的關切，並預備在危機發生時作出犧牲。<sup>9</sup>

有學者認為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本質上一樣，而兩詞分別，是前者在使用上多帶有正面的意思。<sup>10</sup>不過，亦有學者認為兩者本身是有分別的：愛國主義起源可追溯至希臘和羅馬帝國時期，而民族群體意識和某些民族的愛國主義形式可以追溯到中古世紀的英國及法國；將愛國主義等同對民族的忠誠是在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才出現，而且到那時候民族主義一詞才正式使用；直到二十世紀前半期，兩詞意思才等同。<sup>11</sup>本文將不區分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

此外，對於「愛國行為」一詞的理解，是從作出這些愛國行為者的角度而言，及從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者角度而言。對他們來說，這些「愛國行為」在道德上均是正確的行為，是表達支持國家的行為表現，但從其他旁觀者及持份者而言，這些「愛國行為」並不一定正確，甚至是對造成傷害的行為，而這些傷害不限於對個別人士的精神或肉體，甚至可能是對政府、團體，或是整體社會不利。舉例來說，市民因為愛國或民族主義激發而進行的杯葛、示威及罷工行為，對當地政府而言，這些行為均會影響該地的社會秩序。因此即使是同一行為，站在愛國或民族主義者而言是「愛國」，對其他人來說並不一定是正確行為。

---

9 Poole, Ross,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in Primoratz, Igor and Pavkovic, Alexksandar (eds), *Patriotism: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Aldershot: Ashgate, 2007), P.129.

10 Poole, Ross,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in Primoratz, Igor and Pavkovic, Alexksandar (eds), *Patriotism: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P.129; Breuilly, John,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in Michener, Roger, *Nationality,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St. Paul: Professors World Peace Academy, 1993), P.19.

11 本段關於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的分別，參看 Boyd C. Shafer 的觀點，轉引自羅志平：《民族主義與當代社會：民族主義研究論文集》，頁 192-193。

本文所討論的香港華人愛國行為，出發點不論是愛國主義還是民族主義，都是因為對認同作為自己祖國的中國，而產生出來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情感。這種中國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是一種集體身份的認同及效忠，是政治良知的反映，並可能演變為普及行為。<sup>12</sup>因此，本文討論及分析的香港華人「愛國行為」，是基於中國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而對中國及中華民族人民的愛戴和關切，而激發出來並以行動方式表現的行為，在性質上是以對中國產生忠誠為主，及對中國懷有歸屬感的表現。不過，愛國主義與民族良知，須跟排外主義作出區分。排外主義是對外國及任何外國東西的敵意。排外主義並不一定導致愛國情感。<sup>13</sup>

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在 1919 至 1926 年間，在香港居住的華人雖然受英國統治，卻多以中國為其本來的居住地方。因此，香港華人多以中國人自居。對於少數入籍英國的香港人是否仍然以中國人自居，<sup>14</sup>不在本文的探討範圍之內。自香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成為英國殖民地以來，香港華人基本上是了解及接受香港是一個由外國人管治的地方，而早期的大部份人口都是因為在香港尋找工作機會，或逃避中國內地的戰亂、饑荒、自然災害而前來，較少排外情緒。<sup>15</sup>不過，隨著中國國內政局的發展，香港華人的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情感，因中國國內愛國事件所影響，並作出相關的愛國行為。

---

12 Tsai, Jung-fang, "From Anti-foreignism to Popular Nationalism: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in Chan, Ming K (ed.)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Young, John 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 - 199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9 - 10.

13 Tsai, Jung-fang, "From Anti-foreignism to Popular Nationalism: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in Chan, Ming K (ed.)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Young, John 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 - 1992*, PP. 9- 10.

14 根據《入籍條例》(Naturalization Ordinance)，香港華人可以申請成為英籍。

15 夏其龍（著），蔡迪雲（譯）：《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頁 263。

## 第二章 從「五四事件」到「國共合作」

### 2.1 「五四事件」與愛國思潮

正如前言所述，本文將五四運動作為「事件」來研究，因此下文將用「五四事件」一詞代表 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發生的學生示威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在 1917 年 8 月宣佈參與戰爭，成為參戰國。在 1919 年，中國作為戰勝國，中國派代表出席凡爾賽和會。當時的中國處於軍閥割據的局面，北洋政府是當時國際承認的中國政權。在和會舉行前，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 – 1924，任期 1913 – 1921）提出了十四項建議，主張廢止秘密外交、民族自決、公正解決殖民地等。中國人民期待山東本來由德國擁有的權益，應隨德國戰敗而歸還給中國。然而，由於西方列強私下各有利益打算，與日本早有默契，而美國總統威爾遜為了維護美國本身的利益，也只好出賣中國的權益。和會在 4 月 30 日決定將以前德國所擁有在山東半島地區的權益給予日本。當中國人民得知有關凡爾賽和會作出山東問題的決定後，激起中國民眾高漲的愛國心及反抗列強的情緒。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西方列強與日本間的秘密協議是對中國主權的不尊重，而凡爾賽條約可說是出賣中國利益，及違背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項建議。中國人民視北洋政府內的親日大臣為賣國賊。1919 年 5 月 4 日，大約二千多名大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聚集，對青島外交問題發表演說，然後在街上遊行。他們聚集在被指作賣國賊的交通總長曹汝霖（1877 – 1966）的住宅趙家樓，並將當時身在曹宅被指作賣國賊的駐日公使章宗祥（1879 – 1962）痛打，更火燒趙家樓。警察事後逮捕了部份參與示威的學生。示威及學生被逮捕的消息迅速散佈全國，多份報章要求釋放學生。「五四事件」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思想及反帝國主義情緒。在中國其他城市，有不少響應五四事件的愛國行為。參與者除了學生以外，亦包括了不同行業的市民，並發起了罷工、罷課及罷市，及抵制日貨的行動。其中金融中心上海，在六月初的時候有

學生二萬餘人罷課，以抵制日貨及取消密約為名義，開會演說、發佈傳單，而各行業包括金融機構均大規模罷市。<sup>16</sup>當時中國其他城市如南京、武漢、蘇州、杭州等大城市都出現罷市的風潮。<sup>17</sup>

在廣東省不少城市如潮州、汕頭、佛山等，都出現響應五四學生運動的愛國行為。<sup>18</sup>五月十一日，廣州各界人士共十萬人參加國民大會，會上國會議員及團體領袖發表演說，群眾後來分成九十九隊，每隊百人，各持寫上不同愛國口號的小旗遊行。代表更要求廣州軍政府取消二十一條款及其他不平等條約及收回青島等。由於軍政府，及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支持，廣州市民，特別是學生，多次舉行遊行、罷課、抵制日貨、復興國貨等活動。<sup>19</sup>中國人民的愛國思想及反帝國主義情緒熱潮因五四事件而激發，而知識份子也尋求令中國擺脫衰弱而達到富強的方法。共產主義及其中包含的反帝國的思想亦於五四事件後更為知識份子所接受。

## 2.2 中國共產黨與反帝國主義思想

自從 1917 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在中國一些年輕知識份子便開始組織團體研讀馬克思（1818 - 1883）的著作。<sup>20</sup>到了 1919 年發生五四事件後更加速了這趨勢的發展<sup>21</sup>。1920 年，陳獨秀（1879 - 1942）和李大釗（1889 - 1927）在北京組成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sup>22</sup>1921 年，他們在蘇俄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於上海成

---

16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80 年），頁 239 - 264。

17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頁 265 - 300；彭明：《五四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239 - 264。

18 沙東迅：《五四運動在廣東》〔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 年〕，頁 361 - 397。

19 關於廣州市民對北京五四愛國運動的響應，參看林忠佳、張添喜主編：《申報》廣東資料選輯·九(1914.1 - 1919.12)》〔廣東：廣東省檔案館《申報》廣東資料選輯編輯組，1995 年〕，頁 423 - 493；沙東迅：《五四運動在廣東》，頁 57 - 130。

20 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頁 87。

21 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頁 87。

2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 年），頁 27。

立中國共產黨，並在《中國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主義者要按照共產主義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社會，要通過革命的階級鬥爭，去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sup>23</sup>此外，在財政資助及策略指導上，中國共產黨均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援。<sup>24</sup>中國共產黨早期深受共產國際的思想所影響及主導，因此反帝國主義的思想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中早已根深蒂固。

根據蘇俄共產黨領導人列寧（1870–1924）的理論，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亦即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和最後階段。資本主義會從本國到較落後的地區進行資本輸出及擴張。對這些先進的工業國家來說，落後國家便是無產階級，要對落後國家的資源及勞工進行剝削，這種情況便跟資本家對無產階級進行剝削一樣。在列寧眼中，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帝國主義的國家。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等帝國主義國家通過在非洲建立殖民地，及瓜分中國等方法去擴張資本主義。因此蘇俄便須通過進行國際性的革命，以突破帝國主義國家的枷鎖之中。<sup>25</sup>

中國共產黨在 1922 年 7 月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反帝國主義及反封建的民族主義革命綱領，包括「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逼，實現一個絕對獨立的中華。」<sup>26</sup>。在決議案中，中國共產黨認為世界帝國主義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企圖在全世界恢復經濟優勢，並進攻無產階級。<sup>27</sup> 這其實是與蘇俄共產主義的理論相呼應。

---

2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頁 27。

24 程昭星：〈共產國際的幫助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編：《共產國際、聯共(布)秘檔與中國革命史新論》（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年），頁 121 - 123。

25 關於列寧的理論，參看 Ozinga, James R, *Communism: The story of the idea and its implementati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1), PP. 90 – 93。

26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香港：中文圖書供應，1974 年），頁 58。

27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頁 57。



受 1922 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下文將闡述有關事件）所鼓舞，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內地不同地方發動以反帝國主義為名的罷工潮，其中較重要的包括安源路礦工人罷工、開灤煤礦工人罷工和京漢鐵路工人罷工。據中國共產黨的資料，自 1922 年初海員大罷工起至 1923 年初的京漢鐵路工人罷工止，在中國內地共有大小罷工 100 多次，參加人數在 30 萬以上。<sup>28</sup>可見反帝國思想通過共產黨在中國不斷傳播。

## 2.3 孫中山與民族主義思想

反帝國主義思想並不是共產主義所獨有的語言，中國民族主義者如孫中山（1866 – 1925）的思想亦有反帝國主義思想的成分。在清朝末期，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中的排滿思想是出於政治因素而非種族因素，因為他認為外族統治是中國政治衰落的原因，故此排滿是令中國富強的首要條件。<sup>29</sup> 他鼓吹一個種族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革命，而排滿思想為所有漢人團結一致提供了動力，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部份。<sup>30</sup>

由於孫中山深信中國革命的成功要依靠外國力量的援助，他為了爭取外國對中國革命的援助，孫中山在 1920 年前沒有採取堅強的反帝國主義姿態，<sup>31</sup>未有將中國人民的愛國民族情操轉變為強大的政治力量。<sup>32</sup>然而，他多次爭取西方列強的支持，希望創立一個全中國均認同的民族意識，卻仍然失敗。<sup>33</sup>由於他的反清革命及護法運動未能拯救中華民族，他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思想或許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因為列寧的反帝國主義思想強調列強對中國的政治衰敗應負上主要責

---

2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頁 46。

29 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頁 7。

30 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頁 7。

31 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頁 8。

32 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頁 12。

33 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頁 11。

任。<sup>34</sup>因此，孫中山在晚年，將傾向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想改變為抗拒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觀念，而他的思想改變的同時，正是他接受蘇俄專家協助他改組國民黨及教導他動員群眾反對列強侵略的時間。<sup>35</sup>孫中山晚年採用了列寧帝國主義的理論，說中國「受了美國的鼓勵」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但這場戰爭是「一國的帝國主義和別國的帝國主義相衝突的戰爭，不是野蠻和文明的戰爭，不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結果「一個帝國主義打倒別個帝國主義，留下來的還是帝國主義」。<sup>36</sup>

孫中山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目標是促進中國的國際、政治及經濟地位上的平等，並指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是互不相容。<sup>37</sup>可見在 1920 年代，受蘇俄影響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及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均鼓吹反帝國主義思想，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潮在 1920 年代也在民族主義思想及反帝國思想的影響下持續下去。

## 2.4 「國共合作」<sup>38</sup>

孫中山在 1923 年回到南方希望統一中國，但卻缺乏經費去維持軍隊的費用，他因未能得到西方列強的援助，而就經費問題向蘇俄表達了願望。<sup>39</sup>蘇俄自十月革命後，由於政權尚未穩固，希望得到中國方面支持，以抵抗其他國家，特別是日本的威脅。<sup>40</sup>由於蘇俄亦有意與孫中山及國民黨合作，這便出現了第一次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機會。

---

34 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頁 12。

35 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頁 11 - 12。

36 張其昀編：《國父全書》（台北：國防研究院，1960 年），頁 187, 201 及 202，轉引自（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頁 13。

37 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頁 11 - 12。

38 不同學者會用「國共合作」或「統一戰線」說明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間的合作。本文統一使用「國共合作」一詞。

39 李玉貞：《孫中山與共產國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年），頁 226。

40 黃修榮：《國共關係史》，上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87。

1922 年下半年，共產國際希望以「黨內合作」的方式與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合作，讓中國共產黨在合作中保持獨立性，通過加入國民黨去接觸群眾，宣傳共產主義思想，<sup>41</sup>並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勞工群眾。<sup>42</sup>此種合作方式，是因為共產國際明白中國共產黨當時實力不足，且工人階級還未成形，難以在中國獨立地完成無產階級革命。<sup>43</sup>

孫中山明白中共壟斷了蘇俄的物資援助，因此允許中國共產黨黨員入黨，是要將蘇俄的物資援助轉給國民黨。<sup>44</sup>1924 年，中國國民黨正式改組，容許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sup>45</sup>在國共合作期間孫中山逝世（1925 年 3 月 12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 1925 年 5 月在廣州召開了第一屆三中全會，在宣言中表示接受孫中山的遺教，並聲明孫中山的學說為國民黨的最高原則。<sup>46</sup>因此，國共兩黨仍處於合作關係，國民黨支持工人運動的路線亦不變。

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的時期，國民黨的左派勢力強大，他們與共產黨在思想上較接近，都傾向宣傳反帝國主義，向西方國家表達對中國政治現況的不滿。

## 2.5 小結

本章略述五四事件在中國引發出來的大規模愛國主義思潮。愛國思潮在中國的興起並不是偶發性。1919 年的「五四事件」不過是中國在巴黎和會被列強出賣而將中國人民的愛國思潮全國性地激發出來。中國國內的愛國及反帝國主義思潮

---

41 North, Robert C,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64.

42 黃修榮：《國共關係史》，上卷，頁 121。

43 中共在 1923 年只有 432 名黨員；參看郭恒鈺：《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台北：東大圖書，1989 年），頁 55 - 57。

44 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頁 87。

45 國民黨視此為「容共」策略，而中國共產黨則視為「聯共」；參看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新竹：商務印書館，2016 年），頁 113。

46 郭恒鈺：《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頁 116。



自「五四事件」後在 1920 年代繼續興起。由於國民黨與中共的思想都包含了反帝國主義意識，隨著國共合作，加上反帝國主義思想的宣傳正好配合了當時中國國際地位的衰弱的情況，當愛國事件發生，愛國行為便會變得激烈。

### 第三章 香港社會中的華人與政府

#### 3.1 香港社會與華人社群

在探討 1917 至 1926 年間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時，我們需要先了解在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社會的華人社群的情況。

香港開埠初期，需要大量勞動人口去從事經濟建設。這些勞動人口不少來自中國內地地區。由於中國因太平天國的戰事，華南地區經濟情況惡化，人民想逃避中國的戰亂、饑荒、自然災害，及到其他地方找尋工作機會，便來到社會比較平穩安定的香港。這些華人不少對香港根本沒有歸屬感。他們打算在香港賺取金錢後便會回到自己的家鄉。<sup>47</sup>此外，由於美洲、澳大利亞及南洋地區等的礦場及種植園等對勞工有強烈需求，外商自 19 世紀中葉便多在中國港口招攬華工以解決國際廉價勞工短缺問題，以獲取華工的供應。<sup>48</sup>因此香港成為了苦力貿易的中轉站，不少華人通過香港到外地從事勞動工作，並帶動了香港的航運業及金融業。香港的經濟發展正提供中國內地華人一個短期居住的地方。

香港在 1911 年、1921 年及 1931 年的人口，分別是 45 萬、62 萬及 83 萬人。<sup>49</sup>根據 1911 年、1921 年及 1931 年的人口普查，香港華人的出生地為非香港的中國地區分別是六成、七成，及五成，而其中大部份均是出生於廣東。<sup>50</sup>因此，可以估計在 1919 年至 1926 年間，香港華人有五成至七成是在中國內地出生。再者，香港華人人口的男女比例的差距嚴重。1921 年及 1931 年的女性人口分別是

47 關於香港開埠初期的華人勞工狀況，參看 Munn, Christopher, *Anglo-China –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 – 1880* (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1), PP. 78 - 86。

48 〈澳大利亞〉顏清湟著，栗明鮮、夏躍夫譯，姚楠校訂：《出國華工與清朝官員》（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90），頁 35。

49 參看 1921 年及 1931 年香港政府的人口普查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1921 and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1931*)。

50 參看 1911 年、1921 年及 1931 年香港政府的人口普查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1911,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1921, and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1931*)。

男性人口的六成及七成。因此，可以推算香港的男性勞動人口主要視香港為提供工作機會及賺取金錢的地方，而未有帶同家眷來香港定居的打算。

在香港開埠初期，財富和土地主要掌握在洋人手上。但自 1860 年代開始，隨著華人人口急速增長，華人通過從事商業活動，不少已累積了大量的財富。他們與中國國內供應商及在澳洲、東南亞、美洲的海外華人的聯繫，促進香港成為船務及貿易中心。<sup>51</sup>社會上因此出現了一批對殖民地有影響力的華人領袖，他們主要是買辦及華商，當中部份有接受西方教育，通曉英語，以財富或學識成為華人中的精英領袖，以華人代表自居，成為了香港社會中的華人精英階層。華人精英為了自身利益，希望香港的經濟不會因中國的政局受影響，並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參與。他們在政治議題上多與港府採取同一立場，以確保香港的繁榮安定為目標。在二十世紀初已有部份華人精英視香港為他們的永久居住地，<sup>52</sup>因此香港的安定繁榮對保障他們的利益甚為重要。華人精英階層的利益，與一般市民的利益有所不同。在利益出現衝突的情況下，華人精英往往會保障自己的利益。這個問題在下文提及有關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時，將會作出討論。

### 3.2 香港殖民地政府對華人的管治

英國政府與香港殖民地政府同樣重視香港作為自由港的經濟價值。從佔領香港開始，英國政府一直將香港成為英國在亞洲的自由港口作目標。對英國政府來說，香港的經濟利益非常重要。1843 年 6 月，英國外交部（Colony Office）大臣史丹利（Lord Stanley, 1799 - 1869）在香港宣佈為英國殖民地時，便明確指出英國奪取香港只不過是為了外交、商業及軍事上的需要。<sup>53</sup>

51 Sinn, Elizabeth, *Power and Charity :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84.

52 Carroll, John M., *Edge of Empires :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13.

53 丁新豹：〈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1841-1870）〉〔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論文，1988 年〕，頁 216。

由於英國佔領香港的目的是以貿易為主要原因，所以英國政府沒有發展出一套完善的制度去治理華人。外交部大臣是政治家，對大英帝國的眾多殖民地的情況掌握不多，他們在主理殖民地的運作往往依賴地方官員的匯報。派駐殖民地的官員也不一定可以充分掌握該地的具體情況及訊息，要依靠本地的人員，而且地方官員通常只會逗留數年然後便要調職，未能累積有關經驗提高管治效果。因此，殖民地在施政上會有失誤的地方。<sup>54</sup>

香港是第一個在海外主要由華人組成的地區的直轄殖民地，在管治上並無先例可依循。<sup>55</sup>香港殖民地政府早期沒有一套全面的管治華人的政策。港督很大程度上要根據個人的經驗智慧，去進行有效施政。隨著香港人口愈多，在施政上便愈複雜，而香港的居民主要是華人為主。早期的香港社會華人大多為移民，並沒有打算以香港作為長期的居住地方。不過，隨著 1860 年代華人精英累積財富，創造了有利條件，讓他們與香港殖民地政府間有了「夥伴關係」分享權力<sup>56</sup>。

在分享政治權力上，港府沒有積極放權讓一般華人市民參與政治。香港殖民地政府明白要管治香港，需要華人精英的協助。港府希望爭取他們對殖民地政府統治上的支持，願意集中與華人精英溝通，及願意給予較多權力予華人精英，並與他們維持良好關係。<sup>57</sup>1880 年香港政府委任伍廷芳（1842-1923）為首位華人定例局（即後來的立法局）議員，但他是以暫委方式擔任議員，該議席並不是華人永久議席。到了 1884 年，香港政府委任黃勝（1825 – 1902）為定例局議員，香港華人在定例局自始有永久議席。黃勝本身是華人精英，是專門為華人提供醫療

54 本段關於殖民地的施政問題，參看丁新豹：〈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1841-1870）〉，頁 216。

55 丁新豹：〈歷史的轉折：殖民地體系的建立和演進〉，載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第三章（香港：三聯書店，2017 年），頁 87。

56 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27 - 28。

57 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頁 31。

服務的東華醫院的十三位倡建總理其中一人。<sup>58</sup>香港政府除了委任華人精英進入權力機關，也委任他們進入如潔淨局<sup>59</sup>等公共機構，參與公共事務。

從以上所見，香港的社會層是存在著不同背景的華人。雖然香港處於中國邊緣地區，香港華人並不算是海外華人，但要了解香港華人的政治態度，可以依靠學者王賡武分析十九世紀以降海外華人政治態度的方法，將他們分為以下三類：

- 1) 主要關心的是中國的國家政治及其國際後果；
- 2) 主要關心的是所在地的社區政治；及
- 3) 被牽入非華人統治集團的政治(不論其為土著的還是殖民地的抑或是民族主義的)<sup>60</sup>

因此，當談論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時，不應視所有華人都有一致性的愛國行為。香港華人當中不一定所有都有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情感。因此，如果社會上是較多關心中國的國家政治的第一類華人，他們的愛國情緒會較強，較傾向對中國國內發生的事件作出響應的愛國行動。如果社會上是較多第二或第三類華人，他們則對中國國內的事情較不關心，未必會積極參與愛國行為。華人精英往往便是這些第二或第三類華人。在本文所探究的 1919 年至 1926 年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華人精英的態度亦顯得與一般華人不同。他們注重商業利益，對於不利香港經濟的行為並不一定熱心支持。關於香港華人愛國行為在下文將會談及。

### 3.3 香港殖民地政府對華人愛國行為的處理

---

58 〈一八七四年東華醫院徵信錄——一八六九、一八七二年總理、協理、值事名單〉載何佩然（編著）：《源與流——東華醫院的創立與演進》（香港：三聯書店，2009 年），頁 87 - 88。

59 潔淨局在 1883 年成立，目的在提升香港公共衛生水平。

60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 年〕，頁 156。

香港政府的基本政策，是保障英國人在華利益，讓香港不會牽涉於中國的動盪政治環境中，影響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及經濟價值。如前文所述，1919 年至 1926 年間香港的人口以華人為大多數，而他們多為移民人口。因此，香港政府對在殖民地發生的華人的愛國行為需要小心處理。首先，香港政府要小心認清有關的愛國行為是否威脅及挑戰殖民地政府及宗主國的政權。再者，香港政府要注意這些行為會否影響宗主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此外，香港政府要評估這些愛國行為本身的嚴重性有多大。香港政府需要對這些行為作出對策，以穩定香港社會的安定，並確保香港的經濟利益得到維持，及自由港的地位不受侵犯。

事實上，英國政府曾指示香港政府貫徹有關政策，避免香港牽涉中國國內的政治局勢。以 1911 年的辛亥革命作例子，當武昌起義後，英國為了維持本身在中國享有的特殊利益及地位，一方面與清廷保持外交關係，另一方面亦不干涉革命黨活動，採取中立態度而靜觀其變。<sup>61</sup>香港報章在 10 月 10 日後兩天才報導此事，而市民反應亦很平靜，到了 10 月 18 日才有第一次的群眾聚會，及 11 月 6 日才有香港華人有史以來的街上慶祝巡遊活動。<sup>62</sup>對於這些行為，及後來一些反滿人及排外行為，香港政府採取謹慎圓滑的手段，盡量不利用警方干涉，只通過法律加重犯罪份子的懲罰作阻嚇。<sup>63</sup>可見香港政府對華人愛國行為是用較小心及容忍態度處理。

香港自成為英國殖民地以來，發生過多次涉及居港華人的愛國行動。例如在 1884 年，香港工人因為對法國與中國進行戰爭而進行了反法的大罷工；1905 至 1906 年出現了香港華人響應中國內地抗議在美國的華人受到歧視及暴力對待

---

61 吳倫霓霞：〈香港對武昌革命的反應及與粵軍政府的關係〉，載程美寶、趙雨樂〔合編〕：《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香港：香港公開大學，1999 年〕，頁 139。

62 吳倫霓霞：〈香港對武昌革命的反應及與粵軍政府的關係〉，載程美寶、趙雨樂〔合編〕：《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頁 140。

63 吳倫霓霞：〈香港對武昌革命的反應及與粵軍政府的關係〉，載程美寶、趙雨樂〔合編〕：《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頁 152。



的反美抵制運動；1908 年，香港華人響應廣州因中國政府扣查日本偷運的軍火被日方要求道歉而發起的反日抵制運動；1912 至 1913 年香港華人爆發拒搭電車運動，以表達對港府要求一些公共運輸機構停收中國錢幣的不滿。這些行為都顯現了香港華人對中國的愛國情感。不過，香港殖民地政府並沒有通過法律去防止華人表達民族及愛國的情感。在 1919 年前，香港政府頒布了《維持和平條例》（Peace Preservation Ordinance，1886）及《防止杯葛條例》（Boycott Prevention Ordinance，1912）等法例以維持香港的公共秩序，並防止干擾合法的商業活動的行為，<sup>64</sup>但沒有立法禁止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

### 3.4 小結

本章簡述香港社會中的華人社群以外來人口為主的特色，並說明華人精英階層的出現。本章亦說明香港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是重視香港的經濟利益，沒有打算下放太多的權力予華人，而對華人的管治主要是通過華人精英階層。香港政府亦無既定政策處理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

---

64 *Peace Preservation Ordinance, No. 10 of 1886, and Boycott Prevention Ordinance, No. 41 of 1912.*

## 第四章 「五四事件」與香港華人愛國行為

### 4.1 香港華人與「五四事件」

五四事件在北京發生後，香港發生了因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所激發的華人愛國行為。由於對五四事件發生後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進行的專題的研究較少<sup>65</sup>，我們要掌握香港華人在 1919 年間響應五四事件的愛國行為，資料來源主要要依靠當時香港的報紙、時人的回憶，及學者的研究成果。不同的歷史書籍依賴不同的材料，對當時香港支持五四事件的情況有不同的描述。本文嘗試將有關資料整理並對香港華人響應五四事件愛國行為進行分析。

### 4.2 《華字日報》對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的報導

1919 年香港盛行的報紙中，中文報紙方面有《華字日報》、《循環日報》、及《大光報》，而英文報紙方面有《德臣西報》(China Mail)、《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孖刺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及《士蔑西報》(The Hong Kong Telegraph)。<sup>66</sup>由於沒有當時《循環日報》及《大光報》的資料，我們將以《華字日報》作為中文報章，去理解當時香港社會對中國發生五四事件後的反應，並從中了解作為中文媒體《華字日報》對五四事件的看法。

由於當時的資訊傳播需時，《華字日報》在 5 月 7 日才報導北京學生的示威事件。五四事件爆發前，《華字日報》便已對中國的青島問題提出了不少憂慮。例如在 1919 年 5 月 5 日起，《華字日報》就青島問題便在〈論說〉專欄連續刊登了四篇題為〈青島問題之悲觀〉的文章，<sup>67</sup>強調青島是中國不可分割的土地，

65 關於以香港市民響應北京「五四事件」為題材的學術研究較少，其中包括陳學然：《五四在香港》〔香港：中華書局，2014 年〕及陳學然：〈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初期發展：以《華字日報》為中心的考察〉，載陳平原、陳國球、王德威編：《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0-27。本文參考了有關著作。

66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香港：中華書局，2014 年〕，頁 88 - 89。

67 《華字日報》，1919 年 5 月 5 日，1 張 2 頁；1919 年 5 月 6 日，1 張 2 頁；1919 年 5 月 7



中國人須極力爭取收回，要懲辦國賊，並通電各國，說明日本欺壓中國之無理，更要聯合國內海外各界華人振興國貨，及研究救亡方法。<sup>68</sup>5月7日的《華字日報》報導了北京學生示威事件，包括北京各校學生及返國留學生五千人列隊遊行，並報導火燒曹汝霖及毆傷章宗祥，有三十多名學生被捕的消息。<sup>69</sup>5月10日，《華字日報》除了繼續報導北京學生示威運動的消息外，也報導了西方國家早與日本訂立密約，支持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的事件。<sup>70</sup>

接下來的日子，《華字日報》繼續對北京的五四事件、巴黎和會及其他中國城市響應五四事件的情況作出報導或對青島問題提出評論。<sup>71</sup>當時《華字日報》的報導及評論對香港華人的影響力有多大不容易評估。5月26日的《華字日報》，報導了部份市民舉動極文明，表面上沒有表示任何態度，但已撤去屋內陳設的某國（暗指日本）的鏡畫及磁器，而某些公司亦不辦理某國（暗指日本）的貨品。

72

有部份香港華人嘗試做出較激烈的行動，以表達反日的情緒。在五月底，出現了一些來歷不明的勸人振興土貨的白抄。5月28日《華字日報》轉載了香港政府警察司的示諭，「各出巡華差並中西探，如在公眾街上見有貼白抄或種種暴動行為，可即拘案控究，因本港係英國屬土，非比內地也。」<sup>73</sup>。可見當時香港政府已注意香港市民已作出響應北京五四事件的愛國行為。

5月28日《華字日報》的〈論說〉專欄刊登了題為〈可憐可敬之北京學生〉

---

日，1張2頁；1919年5月8日，1張2頁；收於香港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

68 《華字日報》，1919年5月8日，1張2頁。

69 《華字日報》，1919年5月7日，1張2頁。

70 《華字日報》，1919年5月10日，1張2頁。

71 《華字日報》，1919年5月12日至5月30日。

72 《華字日報》，1919年5月26日，1張3頁。

73 《華字日報》，1919年5月28日，1張3頁。

一文，讚美北京學生的愛國行為，<sup>74</sup>並於 5 月 29 及 31 日刊登了長文，名為〈精神救國論：敬告我熱心國貨之親愛同胞〉，呼籲中國人民要振興國貨以救國。<sup>75</sup>6 月 2 日的《華字日報》有一則由「中國興華製麵公司」刊登的廣告，呼籲中國同胞「請用國貨以救國亡」，<sup>76</sup>而同一天該報亦刊登了三天前廣州的抵制日貨風潮。

77

6 月 4 日，《華字日報》報導了香港永樂街及皇后大道一帶，貼有提倡國貨之白抄，措詞激烈，甚至警局附近亦有白抄。<sup>78</sup>同日的香港大小報刊報導了一宗由 9 名 8 歲至 17 歲學生發起的持傘遊街案。<sup>79</sup>當時情況是共 9 名穿著校服的陶英學校學生，手持中國製造並用白油寫著「國貨」二字的油紙傘在灣仔街上行走，被警察干涉並拘捕。<sup>80</sup>該校校長後來亦被拘捕，被控以指使學生持傘遊街的舉動，使一百多人在他們身後阻塞道路，而事前並沒有向華民政務司申請。<sup>81</sup>此外，亦有另外兩名學生同樣持傘遊街被捕。<sup>82</sup>

對於這次持傘的愛國行為，檢控官強調香港司法官員必須採取一切措施，嚴加遏制可能發生的麻煩，<sup>83</sup>檢控官認為不能警戒了事，否則恐怕會助長學生的氣焰<sup>84</sup>，最終學生被判罰款了事<sup>85</sup>。學生持傘遊街案本來是極小的遊行，卻引起了香港市民的重視，並激發起學生們購買油紙傘，而整體上的國貨銷情進一步急漲。<sup>86</sup>不過，大型的街頭行動始終沒有發生。持傘遊行事件是香港響應五四事件的

74 《華字日報》，1919 年 5 月 28 日，1 張 2 頁。

75 《華字日報》，1919 年 5 月 29 日，1 張 2 頁；《華字日報》，1919 年 5 月 31 日，1 張 2 頁。

76 《華字日報》，1919 年 6 月 2 日，1 張 2 頁。

77 《華字日報》，1919 年 6 月 2 日，1 張 2 頁。

78 《華字日報》，1919 年 6 月 4 日，1 張 3 頁。

79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頁 102。

80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頁 103 - 105。

81 《華字日報》，1919 年 6 月 5 日，1 張 3 頁。

82 《華字日報》，1919 年 6 月 6 日，1 張 3 頁。

83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頁 109。

84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頁 109。

85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頁 108。

86 陳學然：〈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初期發展：以《華字日報》為中心的考察〉，載陳平原、陳國球、王德威編：《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頁 20。

重要例子。

### 4.3 時人對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的回憶

除了報章外，時人的回憶也可以讓我們理解五四事件後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的內容。

根據學者陳君葆的回憶，當時他就讀香港大學，在得悉北京的學生運動後，與同學聚集於大禮堂，要求校方准許學生開會，及打電報到巴黎向和會力爭，但因校方勸導而沒有成事。<sup>87</sup>陳君葆並不太清楚校外的情況，但他對一兩件事仍記得清楚。他知道香港的中等學校的反應有「一定程度的激烈」，「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是沒有，可是零星的三五個人持油紙傘結隊的巡行」卻是有的。<sup>88</sup>至於持油紙傘結隊巡行的在傘上面也不過用大字寫著「抵制日本」及「振興國貨」等較溫和的字眼。<sup>89</sup>此外，陳君葆也聽說過一些持傘遊行的學生被抓進中央警署一段時間，經過訓誡才釋放。<sup>90</sup>陳君葆的描述基本上與《華字日報》的內容脗合。對他來說，整體而言，五四愛國運動的浪潮澎湃高漲，瀰漫著整個中國的時候，香港也受到一些衝擊，說不上是震撼。<sup>91</sup>

根據另一位學者陳謙的回憶，香港華人回應中國的五四事件有較激烈的愛國行為。當時居住在灣仔的群眾，到日本商店門前示威，破毀門窗，高呼抵制日貨的口號，就算警察禁止，不久又再發生。香港的私立漢文學的語文老師，在講壇上慷慨激昂地陳述國恥，又以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為課文命題。部份學生更將家裡

87 陳君葆：〈四十年的回憶 - 寫於五四運動四十週年〉，載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文集》〔香港：三聯書店，2008 年〕，頁 383 - 384。

88 陳君葆：〈四十年的回憶 - 寫於五四運動四十週年〉，載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文集》，頁 384。

89 陳君葆：〈四十年的回憶 - 寫於五四運動四十週年〉，載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文集》，頁 384。

90 陳君葆：〈四十年的回憶 - 寫於五四運動四十週年〉，載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文集》，頁 383 - 384。

91 陳君葆：〈四十年的回憶 - 寫於五四運動四十週年〉，載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文集》，頁 383。

的日貨，搬到街上當眾燒毀，而家庭主婦拒絕使用日製火柴。華商集會，並決議提倡國貨。至於先施、永安、大新及真光等百貨公司，則宣稱今後會多採辦國產絲綢及蘇杭雜貨，並歡迎公眾到公司檢查是否售賣日貨。不過，有公司則暗地裡改頭換面地售賣日貨。<sup>92</sup>

根據陳謙的回憶，為了控制華人愛國行為的擴大，香港政府派遣武裝警察在灣仔日人商店前及附近地方日夜巡邏，並對日本僑民僑眷予以保護，送食送水。日本則派遣戰艦駛泊在鯉魚門外，向香港作出示威恐嚇。駐香港日本領事更向香港的教育司，要求指令漢文視學官查看全港私立漢文學校，如有採用某提倡國貨抵制日本的言論，即須禁止。香港政府的華民政務司通知《華字日報》及《循環日報》等，不可煽動抗日愛國的言論，及提及帝國主義的詞語。<sup>93</sup>

在提及中國五四事件對香港的影響時，部份香港史的書籍多引用陳謙的回憶，描述在 1919 年香港在五四事件後的狀況，將當時香港華人形容為充滿愛國熱情，積極響應發生在北京的學生運動。<sup>94</sup>另一方面，有部分學者持不同的論調，認為當時香港華人對中國的五四事件的回應不大，其中原因是當時香港沒有正式的港督在任，當時署理港督職務的官員的治港方針便是要香港不容有亂，以和平無事為目標。<sup>95</sup>

---

92 本段關於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見陳謙：〈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合編：《廣東文史資料 - 第 24 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 年〕，頁 41 - 42。

93 本段關於香港政府對華人的愛國行為的對策，見陳謙：〈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合編：《廣東文史資料 - 第 24 冊》，頁 42。

94 有關引用陳謙的資料描述當時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參看蔡思行：《香港史 100 件大事(上)》（香港：中華書局，2012 年），頁 65 - 66；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年〕；沙東迅：《五四運動在廣東》，頁 170。

95 陳國球：〈香港的五四和香港的中國〉，洪清田主編：《人文香港：香港發展經驗的全新總結》〔香港：中華書局，2012 年〕，頁 65 - 66。

#### 4.4 香港華人響應「五四事件」的愛國行為

由於資料選取上的不同，所以出現了不同學者對於五四事件發生後香港的愛國行為內容有不同的理解。然而，綜合以上報紙的報導及時人的回憶，香港在 1919 年五四事件發生後的愛國行為並不算激烈。

根據北京英國公使館（British Legation）向英國外交部（Foreign Office）遞交關於中國在 1919 年 4 月至 6 月局勢的情報總結報告（Summary of the Intelligence Reports for the quarter ending June 30<sup>th</sup>, 1919）中，廣州的反日杯葛行動並不及其他城市火熱，是在較寧靜地進行，反而其他城市如南京及長沙，反日的情緒仍然高漲。<sup>96</sup>因此，在中國南方城市的廣州，市民愛國行為的激烈程度亦及不上其他在地理上較接近中國中部或北部的其他城市。此外，根據關於中國在 1920 年 1 月至 3 月局勢的情報總結報告（Summary of the Intelligence Reports for the quarter ending March 31<sup>st</sup>, 1920）中，它形容廣州的杯葛日貨行動已經減退，不似 1919 年的夏季及秋季激烈，而日貨亦已經湧進廣州。<sup>97</sup>雖然報告沒有詳細描述所謂激烈及減退的具體情況，但可以推論廣州市民響應五四事件的愛國行為在 1919 年底的熱潮已退。香港地處於廣州以南，與發生五四事件的北京距離更遠，華人響應五四事件的愛國行為比其他城市溫和也就不足為奇。

香港政府對香港市民在五四事件發生後的愛國行為採取的行動並不算嚴厲，始終這些行為並未有威脅香港殖民地政權的意圖。以反日為目標及復興國貨的行為的嚴重性並沒有演變為反對殖民地政府政權的行動。反帝國主義的口號亦沒有在香港的愛國行為中出現。如果這種意識轉化為反帝國主義的意識，自然會對殖民地政府的政權帶來嚴重的後果。因此，香港政府對學生持傘行為提出起訴，不

---

96 Jarman, R. L. (Ed.), *China: Political Reports 1911- 1960 Volume 1 1911 - 1921* (England: Archive Editions, 2001), PP.195 – 212.

97 Jarman, R. L. (Ed.), *China: Political Reports 1911- 1960 Volume 1 1911 – 1921*, P.324.

過想防止事件引發大規模香港市民的愛國意識。

## 4.5 小結

本章簡述香港社會中的華人響應 1919 年北京五四事件的愛國行為。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與中國國內的政治局勢及思潮是息息相關的。五四事件在中國國內激起的愛國熱潮牽動了香港華人的愛國情緒。從當時報紙的報導及時人的回憶，可見香港雖然有響應五四事件的愛國行為，例如一些「持傘行動」及抵制日貨的行為發生，但不見得有大規模或激烈的愛國行為。這些愛國行為不過是以反日為重心，並鼓勵市民購買國貨。礙於香港的政治及社會環境，令五四事件的熱潮在香港沒有更大型及持久地維持下去。由於五四事件，中國其他城市如上海、廣州等都出現了大規模的罷市或罷課行動，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的激烈程度是相對溫和的。然而，香港畢竟是英國殖民地，市民對五四事件的激烈程度不及其他中國城市，是可以理解的。



## 第五章 省港大罷工與香港華人愛國行為

### 5.1 省港大罷工前的罷工行動與香港華人愛國行為

在現有的香港史研究中，有不少著作談及自 1920 至 1922 年間香港發生的兩次示威罷工行為，包括 1920 年的機器工人罷工<sup>98</sup>及 1922 年的海員大罷工，而部份著作在提及 1922 年的海員大罷工時，都將它視作香港工人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行為。<sup>99</sup>本節將略述海員大罷工的經過，並分析罷工行動中香港華人是否表現出愛國行為。

1922 年發生的海員罷工主要是工人自發的行為<sup>100</sup>，但也有愛國行為的成分。香港華人海員的生活報酬不能應付生活需要。當時的海員工會，即「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於 1922 年 1 月向船公司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卻得不到資方的理會。1 月 12 日，工會下令罷工，一星期內便有 6500 多名海員參與罷工行動。<sup>101</sup>當時除了海員參與罷工外，其他如碼頭起貨工人及煤炭工人等都參與罷工行列。2 月 2 日，香港政府宣佈「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為非法團體。經過多次談判，政府與罷工工人仍未能達成協議。其中東華醫院、保良局、華商總會、華工總會

98 1920 年香港發生的機器工人罷工是工人的自發行為，主要出於經濟原因。由於當時香港物價飛漲，機器工人入不敷支。歐籍機器工人獲得兩至三成的加薪，又能獲得免費住宿，華工便提出加薪要求，但被資方拒絕。工會於是在 3 月發動機器工人罷工。罷工行動得到廣東的工會的支持，提供了金錢及住宿方面的援助。機器工人也得到香港其他行業的工人相繼支持，結果資方讓步，機器工人獲得加薪。有關 1920 年發生的機器工罷工事件，參看蔡思行：《香港史 100 件大事（上）》（香港：中華書局，2012 年），頁 221 - 225；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07 - 109；Carroll, John M.,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6 - 97.

99 參看梁寶龍：《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香港：中華書局，2017 年）；陳明錄主編，梁寶霖、梁寶龍、趙永佳、陸鳳娥合編：《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香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1986 年）。

100 雖然部份著作將海員罷工的發起歸因於國民黨或共產黨的參與，但相信國共兩黨都沒有在發起罷工方面有積極的參與。國民黨一直只是在聲稱支持海員罷工，但沒有實際上的行動。至於中共當時在香港的發展仍然在起步階段，亦未有在罷工活動有太多的參與。關於學者對國民黨及共產黨在海員大罷工的參與度的不同見解，參看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 - 1949）》（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1 年），頁 40 - 45；香港海員工會：《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香港：香港海員工會，2013 年），頁 27；陸恭惠：《地下陣線》（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54。

101 香港海員工會：《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頁 22。

及僑港工團總會等華人精英領導的組織都曾嘗試居中調停<sup>102</sup>，並勸告海員妥協，但未能成功。

2 月 27 日，香港政府宣佈戒嚴，調動中國各口岸的英國軍艦駐守香港，並禁止九廣鐵路通行，英軍巡查街道，華人離港需要店鋪的擔保，企圖阻止華人勞工離港罷工。華人勞工不理禁令，徒步前往廣州，響應海員罷工。在 3 月 4 日，約二千名華工途經新界沙田前往廣州。在場的英軍在作出警告後開槍射向華工，造成傷亡，事件稱為「沙田慘案」。於是，香港的郵電、銀行、造船、電車、報館、印刷、酒店等行業工人紛紛加入罷工，人數達 10 萬以上，令全港生產停頓。<sup>103</sup>香港政府結果取消「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的封閉令，而船東亦同意增加工資，香港工人結束罷工。<sup>104</sup>

海員罷工的性質可說混合了經濟原因及政治因素。客觀而言，罷工行為在開始的時候，起因很大程度上是海員為了爭取較好待遇。罷工性質初期是勞資糾紛，而不應視為與愛國及民族主義有關。然而，到了海員工會遭香港政府宣佈為非法組織，及後來「沙田慘案」的發生，因而激發起其他華籍工人的罷工行為，則可以理解為是出於華人的愛國情緒。正如上文所述，愛國及民族主義是涉及對國家的情感，對國家或人民的福祉有一種特別的關切。當其他華籍工人因同情華籍海員的遭遇，而響應罷工行動，便可視作愛國行為。特別是海員罷工事件令港府將海員工會列為非法組織，及發生「沙田慘案」，演變成華人與政府間的衝突對立，令郵電、銀行、造船、電車、報館、印刷、酒店等行業工人加入罷工行列，表現

---

102 《華字日報》1922 年 2 月 10 日，第一張三頁；盧權、裨倩紅：《省港大罷工史》〔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53 - 54；有關東華醫院在海員大罷工中參與調停的工作的細節，參看梁寶龍：《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頁 71 - 87。

103 廣東省地方史誌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志大事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262 頁。

104 有關 1922 年發生的海員大罷工的內容，本文參考了香港海員工會：《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頁 21 - 28；蔡思行：《香港史 100 件大事（上）》，頁 232 - 237；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頁 111 - 119；Carroll, John M.,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PP. 97 - 99.



出其中的愛國情緒。

總括而言，機器工人罷工純粹是工人要求加薪的工業行動，不涉及愛國行為的成分，但它的成功提高了工人爭取權利的意識，有助後來海員大罷工的發起。海員大罷工的起因雖然是勞資糾紛，但隨事件的演變而觸發其他行業工人的罷工行動，而激發起愛國行為。海員大罷工基本上是香港工人單方面進行組織，沒有如下文所闡述的省港大罷工，是依靠中國國內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來主導及組織。

## 5.2 省港大罷工的起因

省港大罷工從 1925 年 6 月至 1926 年 10 月止。它的起因源於 1925 年在中國上海發生的五卅慘案。

1925 年 5 月，日本在中國並共有 41 家紗廠，共雇用中國工人 8 萬 8 千多人，在上海共有 27 家，雇用 5 萬 8 千多中國工人，其中日本內外棉株式會社在上海共有 11 間工廠，<sup>105</sup>在上海的中國工人受到資方的壓逼，包括遭到打罵，受到無理克扣及剝削，並需長時間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工作。<sup>106</sup>1925 年 2 月，日本內外棉株式會社多間工廠工人罷工，雖然工人與資方達成了協議，資方接受了不許打及無故開除工人等條件，但到了 4 月和 5 月的時候，資方撕毀了 2 月時與工人簽訂的協議，無理開除工人，令工人再度罷工。資方關閉工廠，停發工資，繼續開除工人。<sup>107</sup>1925 年 5 月 15 日，第七廠的日本商人槍殺了衝進工廠要求復工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工人顧正紅。<sup>108</sup>5 月 30 日，上海工人及學生為援助紗廠工

---

105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 - 1926）》（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年），頁 130 - 131。

106 上海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卅運動史料》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212 - 236。

107 盧權、禰倩紅：《省港大罷工史》〔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86。

10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頁 64。

人舉行街頭宣傳和示威遊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向群眾開槍，共多名工人及學生死亡及受傷，<sup>109</sup>此事為「五卅慘案」。此後數天，除上海外，在中國其他地方如青島、漢口、九江等，都有工人罷工及群眾示威的行動。<sup>110</sup>在青島的罷工行動中，工人更被槍殺。<sup>111</sup>於是，這個從上海開始的「五卅運動」形成了全國一遍罷工的浪潮。

「五卅慘案」再一次激發起中國人民的愛國思想及反帝國主義情緒。在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發動的省港大罷工，是包含了反帝國主義的情緒在內，亦是以反英立場作主軸的愛國行為。對國共而言，香港的宗主國即英國政府，在事件中是帝國主義者的象徵，而省港大罷工是國共聯合的反帝國主義的愛國行動，以罷工作為手段，表達反帝國主義及反英的情感。

當時正值國共兩黨合作期間，國民黨當時的左派勢力甚大。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 6 月 1 日於廣東大學召開群眾大會，發表宣言抗議帝國主義在上海製造五卅慘案，<sup>112</sup>並於 6 月 2 日通電全國，號召中國人民響應罷工，<sup>113</sup>以表示反抗帝國主義暴行。此外，國民黨亦號召黨員支持，並表示會援助罷工行動。<sup>114</sup>當時，中國共產黨認為此事是鞏固政治地位的良機，指示其他城市黨支部動員民眾支持上海的罷工行動。<sup>115</sup>其中省港大罷工，是香港華人參與的一次大規模愛國行為。

---

109 確實死亡及受傷人數有不同說法，見陸恭惠：《地下陣線》，頁 56 及 306。

110 秋人：〈省港罷工過去和現在〉，載廣東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省港大罷工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 年），頁 106。

111 上海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卅運動史料》第一卷，頁 497 - 501。

112 廣東省地方史誌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志大事記》，301 頁；李曉勇：〈國民黨與省港大罷工〉，載《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四期，頁 232。

113 李曉勇：〈省港罷工過去和現在〉，載廣東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省港大罷工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 年），頁 106。

114 李曉勇：〈省港罷工過去和現在〉，頁 106。

115 陸恭惠：《地下陣線》，頁 56。

### 5.3 省港大罷工初期情況

1925 年 6 月 19 日，省港大罷工爆發。香港的海員，及電車、印務、搬運、煤炭等行業的工人先後響應省港大罷工。<sup>116</sup>此外，學生亦參與罷課，支援工人的罷工行動。<sup>117</sup>香港的工會向香港政府提出的訴求可以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對「五卅運動」提出的 17 項條件包括收回租界權益等<sup>118</sup>；另一部份則要求香港華人應擁有以下權利：

1. 華人應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絕對自由權；
2. 香港居民不論中、西籍，應受同等法律之待遇，務須立時取消華人驅逐出境條例、笞刑、私刑等之法律及行為；
3. 華人佔香港人口五分四以上，香港定例局應准華工有選舉代表參與之權。其定例局之選舉法，應本普通選舉之精神以數為比例；
4. 應制定勞工法，規定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勞工資，廢除包工制、女工童工生活改善、勞動保險之強制施行等。制定此項勞動法時，應有工團代表出席；
5. 政府公佈七月一日之新屋租例，應立時取消，並從七月一日起，減租一二成五；
6. 華人應有居住自由之權，旗山（太平山）頂應准華人居住，以消滅民族不平等之污點。<sup>119</sup>

116 廣東省地方史誌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志大事記》，頁 302；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 - 1926）》，頁 225。

117 蔡思行：《香港史 100 件大事（上）》（香港：中華書局，2012 年），頁 245。

118 「五卅慘案」後，上海總工會向總商會、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總會及上海學生聯合會四大團體共同組織「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提出的 17 項條件包括先決條件 4 條及正式條件 13 條：先決條件 4 條是要求取消戒嚴令、撤軍及解除武裝、送回被捕華人、恢復公共租界被封及佔據的學校的原狀；正式條件 13 條包括懲兇、賠償、道歉、要求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的自由、要求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權利、收回司法權益、收回租界，及要求取消領事裁判權。見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 - 1926）》，頁 196 - 199。

119 廣東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省港大罷工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 年），頁 129。

香港政府方面，對於港人的罷工行為，港督司徒拔（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 1876 – 1947，1919 – 1925 在任）在 1925 年 6 月 22 日頒佈緊急狀態令，更派出軍警在街上巡邏，搜捕發動罷工的工會領袖。<sup>120</sup>

1925 年 6 月 23 日，廣州的群眾及香港工人在廣州舉行了集會遊行，以抗議五卅慘案的發生。當遊行隊伍經過沙基時，遭沙面租界的英國和法國的軍警射擊，結果有 100 多人死傷。<sup>121</sup>這宗稱為「沙基慘案」的事件，更加激發粵港兩地人民的憤怒及愛國情感，亦增加香港工人罷工的決心，半個月內便有 25 萬工人罷工。

122

由於國共正處於合作的關係，兩黨在省港大罷工，都採取了支持的立場。省港罷工委員會在 1925 年 7 月 3 日成立，<sup>123</sup>以便領導及組織罷工。委員會共有 13 名委員，委員長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蘇兆徵（1885 – 1939）<sup>124</sup>，顧問包括了國民黨的廖仲愷（1877 – 1925）、汪精衛（1883 – 1944），及中國共產黨的鄧中夏（1894 – 1933）、黃平（1901 – 1981）。<sup>125</sup>罷工委員會之上是罷工工人代表會議，為最高議事機關。罷工委員會下設幹事局，分置文書、宣傳、招待、庶務、交通、交際、遊藝等七部，另設財政委員會、築路委員會、保管拍賣局、法制局、會審處等行政機構，處理與罷工有關的事宜。<sup>126</sup>罷工委員會及其他行政機構的成立，可以令罷工運動更有組織地去進行。

---

120 蔡思行：《香港史 100 件大事（上）》，頁 246。

121 洪溫臨：〈省港大罷工初期的粵港關係(1925 年 6 月 – 10 月)〉，頁 334。沙基慘案確實死亡及受傷人數有不同說法，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共產黨的九十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稱當場共 52 人身亡，重傷 170 多人（頁 65 - 66）。

122 洪溫臨：〈省港大罷工初期的粵港關係(1925 年 6 月 – 10 月)〉，頁 335。

123 陳福霖：《廖仲愷年譜》（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頁 344。

124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 - 1926）》，頁 228。

125 陳福霖：《廖仲愷年譜》，頁 344。

126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 - 1926）》，頁 227 - 228。

過了三個多月，省港大罷工已對香港的經濟及社會造成災難性的衝擊。經濟上而言，由於罷工的影響導致工人缺乏，部份商店因人手不足而歇業。自香港開埠以來，航運業一直都是香港的經濟支柱，因為工人的罷工造成大批輪船滯留在港，船上的貨物甚至因無法起卸而屯積在倉庫中引致發霉。此外，不少中小型銀行更因擠兌風潮而倒閉。<sup>127</sup>

在省港大罷工中，國共兩黨採取一系列措施以支援罷工工人。首先，國民黨徵用了房屋，用作香港工人罷工後到廣州的居所。<sup>128</sup>此外，國民黨亦撥出款項包括租捐及來自各方的捐款，讓工人在罷工期間獲得安頓生活的費用，並要求商人及軍界方面捐款以支持罷工行動。<sup>129</sup>廣東和香港兩地除了地理上相連，經濟關係亦非常密切，罷工委員會組織了糾察隊，負責切斷粵港的海路交通，攔截運往香港的糧食，並充公來往香港的英國貨物，<sup>130</sup>藉此打擊香港的經濟，目的是令香港成為「臭港」<sup>131</sup>。罷工委員會這種封鎖香港的方法便令香港的經濟受到重大打擊。

香港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相應的措施以打擊罷工行動，包括禁止白米、麵粉、港幣及金銀元等出口到廣州。此外，港府亦禁止華文報紙、郵件、電報等發佈有關罷工的消息。<sup>132</sup>港府更勸喻香港華商和市民要恢復香港以往的秩序。<sup>133</sup>港督司徒拔曾要求英國政府出兵，企圖利用武力方式，來鎮壓罷工的行動，但遭英國政府方面拒絕<sup>134</sup>。華商代表曾嘗試與省港罷工委員會商討結束罷工行動，但未能取得成果。<sup>135</sup>

---

127 關於省港大罷工對香港造成的影響，參看洪溫臨：〈省港大罷工初期的粵港關係(1925年6月－10月)〉，頁355-357。

128 李曉勇：〈國民黨與省港大罷工〉，載《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四期，頁234。

129 李曉勇：〈國民黨與省港大罷工〉，頁234。

130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頁234。

131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頁231。

132 蔡思行：《香港史100件大事（上）》，頁247。

133 蔡思行：《香港史100件大事（上）》，頁247。

134 洪溫臨：〈省港大罷工初期的粵港關係(1925年6月－10月)〉，頁357。

135 李曉勇：〈國民黨與省港大罷工〉，頁237-238。



## 5.4 省港大罷工方向上的轉折及結束

在省港大罷工進行期間，國民黨於 7 月 1 日宣佈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當時國民黨內部主要有三派的勢力，一派以許崇智（1886–1965）為首，得到粵系軍官的支持；另一派則以胡漢民（1879–1936）為首，得一般官員政客的支持；左派則以廖仲愷及汪精衛為首，得左派黨員、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群眾的支持。

<sup>136</sup>1925 年 8 月 20 日，積極參與規劃罷工行動的廖仲愷被暗殺，<sup>137</sup>國民黨內部因而出現了權力鬥爭。廖仲愷被暗殺對國民黨左派的打擊可說是相當嚴重，但亦激發他們決心爭取國民黨內的權力。在經過內部鬥爭下，結果許崇智「請假起滬」，而胡漢民則「出使蘇俄」<sup>138</sup>。左派曾在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中暫居上風，並在 1926 年 1 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通過彈劾右派（或稱「西山會議派」）的反對「聯俄容共」決議。1926 年 3 月，發生了中山艦事件，<sup>139</sup>令國共關係出現了緊張的局面，而當時為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1887–1975）甚至一度派兵包圍了蘇俄領事館及蘇俄顧問住所，解除了省港大罷工工人糾察隊的武裝<sup>140</sup>，左派的汪精衛亦「稱病出國」。<sup>141</sup>雖然事情後來在蘇俄顧問和蔣介石的商討下得以解決，<sup>142</sup>但蔣介石已在國民黨內掌握權力，左派力量衰落。1926 年 5 月 15 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限制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活動和擔任黨內中央機關的部長。<sup>143</sup>省港大罷工的方向因此隨國民黨內部權力的替換而轉變。

136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 - 1926）》，頁 234。

137 陳福霖：《廖仲愷年譜》，頁 361。

138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 - 1926）》，頁 234。

139 關於中山艦事件，學者對事件有不同理解。由於本文重心不在於分析中山艦事件，因此對事件始末從略。

140 黃修榮：《國共關係史》，上卷，頁 602。

141 黃修榮：《國共關係史》，上卷，頁 602。

142 Wilbur, C. Mart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48.

143 黃修榮：《國共關係史》，上卷，頁 587 - 588。

在 1926 年 1 月的時候，雖然國民黨已平定了南方的軍閥勢力，但是中國其他地區卻處於軍閥割據的局面。當蔣介石在國民黨內掌握權力後，便打算領軍北伐。對蔣介石來說，統一中國是孫中山一生中未能完成的大業，北伐行動將有助國民黨黨內團結，並提升他個人聲望。此外，蔣介石估計在北伐初期如能報捷，便可以團結中國的政界、學術界及企業界，並獲得他們對自己的支持。<sup>144</sup>1926 年 7 月 9 日，國民黨誓師北伐。<sup>145</sup>

共產國際雖然知道蔣介石北伐或會讓他邁向軍事獨裁，但不主張打倒蔣介石，而希望他可以與左派的汪精衛合作。<sup>146</sup>再者，中國共產黨認為通過參與北伐，可以增強對鄉村城市的農民及工人的控制。<sup>147</sup>因此，國共兩黨均以北伐作為合作上的新方向。由於省港大罷工持續多月，支持罷工行動包括工人生活及住宿方面的開支對廣州政府已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sup>148</sup>事實上，省港大罷工能維持多月，是得到國民黨在財政上的援助。<sup>149</sup>因此，結束省港大罷工可免去國民黨在財政及人力資源上的負擔。再者，省港大罷工的持續，有可能逼使英國利用武力解決事件，令列強支持北方軍閥而對抗北伐軍隊，<sup>150</sup>故此結束罷工行動可說是防止國民黨與列強外交關係惡化的手段。

1926 年 7 月，國民黨廣州政府與英國政府經過商討仍未能達成協議。<sup>151</sup>到

---

144 Taylor, Jay,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57.

145 廣東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省港大罷工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 年），頁 16。

146 黃修榮：《國共關係史》，上卷，頁 529。

147 North, Robert C,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P.88.

148 洪溫臨：〈省港大罷工初期的粵港關係(1925 年 6 月—10 月)〉，頁 351。

149 自罷工開始至 1926 年 6 月，罷工委員會的 490 萬收入中，有 280 萬（百分之五十七）是國民政府的租捐及收到的各方捐款，而國民政府財政部，持續地每月給罷工委員會 1 萬元。本身是罷工委員會顧問的中國共產黨員鄧中夏也承認如果沒有國民黨的經費，罷工不能持續，因為單是長期在廣州的 10 多萬罷工工人的生活經費中共方面便不能應付；參看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 - 1926）》，頁 239 - 240。

150 Wilbur, C. Mart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P.68 - 69；

151 Wilbur, C. Mart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P.69；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 - 1949）》，頁 62。

了 9 月，蔣介石指示國民政府外交部通知英國方面將於 10 月 10 日前結束罷工。

<sup>152</sup>省港罷工委員會亦於 10 月 10 日宣佈停止封鎖香港。<sup>153</sup>省港大罷工在維持了 16 個月後終於結束。

省港大罷工發生對香港經濟打擊的嚴重，可以從有關的經濟數據上反映。來香港的輪船的數量方面，1925 以船數計是 1924 年的百分之 16，以噸數計是 1924 年的百分之 36，足見減幅之鉅。至於香港的入口貨值，則由 1924 年的 880 萬英鎊減為 1925 年的 470 萬英鎊。香港的入口稅，由 1924 秋季的 1 167 萬英鎊減為 1925 年秋季的 584 萬英鎊。此外，香港的銀行存款亦減少，破產商店在 3000 間之上。<sup>154</sup>

## 5.5 省港大罷工的香港華人愛國行為

1925 至 1926 年的省港大罷工，明顯是以反帝國主義作口號，對港府以至英國的政權作出直接的挑戰，在行動上的挑釁性比香港華人響應五四事件的愛國行為嚴重得多。基於國共兩黨提供的資源，省港大罷工的規模比之前的 1919 年香港市民的愛國行為大得多，行動上亦更加激烈。省港大罷工時期工人的訴求，已不限於工人的工資福利，而是為香港華人爭取權益。

中國其他地方在五卅慘案後的反英熱潮在 1925 年 9 月後便趨衰落。<sup>155</sup>省港大罷工的愛國行為可以比中國其他城市的罷工持久，說明國共兩黨在省港大罷工的參與及組織的重要性。

---

152 Wilbur, C. Mart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P.69; 蔡思行：《香港史100件大事（上）》，頁247。

153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 - 1926）》，頁 252 - 253。

154 關於省港大罷工對香港造成的經濟損失，見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 - 1926）》，頁 232。

155 洪溫臨：〈省港大罷工初期的粵港關係(1925 年 6 月－10 月)〉，頁 357。



## 5.6 小結

本章對 1922 年的海員大罷工扼要闡述，並詳述 1925 至 1926 年間的省港大罷工。海員大罷工初期不過是勞資糾紛，並沒有滲入太多的民族及愛國主義的元素，但事件到了中後期，當其他行業的工人罷工，而市民與政府出現了對立的狀態，並激發香港市民對政府的不滿並同情華籍海員，產生了愛國情緒。省港大罷工的發生是與國內發生的事件息息相關。由五卅慘案所引發的五卅運動提供正處於合作關係的國共兩黨，發動以反帝國主義為名的省港大罷工。省港大罷工中的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甚為激烈。省港大罷工的結束亦與國內的政治情勢有關，隨國共兩黨在政治上的新目標而落幕。

## 第六章 1919 至 1926 年間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的分析

### 6.1 香港華人愛國行為與中國愛國事件

1919 至 1926 年的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主要是因中國國內的愛國事件發生而激發了民族愛國的情感，而作出響應國內事件的愛國行為。

在 1919 年，香港華人發起愛國行動，以響應北京五四事件的學生示威。在北京，五四事件的口號包括了「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內除國賊、外爭國權」等。香港華人響應五四事件的愛國行為是集中在「抵制日貨」，及「復興國貨」方面，並沒有大規模的罷工、罷課、罷市等行為。雖然香港華人的「持傘行動」不過是個別學校學生的行為，而「抵制日貨」及「提倡國貨」的行為規模亦未足與中國國內的行動相提並論，但可見香港即使在地理上處於中國大陸的邊緣位置，又是英國的殖民地，香港華人仍然受中國國內事件所影響。基於政治環境上，香港殖民地的地位不同於中國國內的其他城市，對五四事件的響應支持不及中國國內地區是無可厚非的。如果沒有其他外在因素（例如省港大罷工中的國共兩黨），香港華人對中國政治事件所作出的愛國行為的規模與持續性只能有限。

1922 年海員罷工中的愛國行為主要是因為香港海員的勞資問題所激發。到了 1925 年，中國國內五卅慘案的發生，讓國共兩黨藉反帝國主義的口號發動省港大罷工，共 25 萬工人參與罷工行動。在中國國內響應五卅慘案而進行的五卅運動中，歷時 16 個月的省港大罷工可說是整個運動中持續最久的行動。

省港大罷工中的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的激烈是有其特別原因。省港大罷工在剛發動不久，廣州便發生了沙基慘案。香港與廣州在地理上鄰近，市民亦以華人為主，對沙基慘案的發生自然比發生在北方城市的政治事件更表示關切。再者，沙

基慘案涉及英國軍警射擊中國人民遊行隊伍，自然更容易激發受英國人管治的香港華人的愛國情緒。當然，省港大罷工的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的激烈，與國共兩黨的主導並組織罷工行動有密切的關係。

1919 至 1926 年間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主要是對中國國內愛國事件而作出的響應。至於愛國行動的規模能否擴大，行動能否持續，都取決於多項因素，例如行動是否有團體策劃，資源是否充足、愛國事件與香港的關係等外在因素。當然，內部因素如香港華人精英階層的取態對香港華人愛國行為亦有影響。

## 6.2 香港華人愛國行為與國共兩黨

1919 年至 1926 年間的香港華人愛國行為，展現了逐漸受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所主導的趨勢。1919 年香港華人響應北京五四事件的愛國行為是由香港華人發起的，顯得較溫和。到了 1922 年的海員大罷工，由於國共兩黨沒有積極參與，罷工帶來的影響尚算受到控制，而事件在兩個月內便得到解決。到了 1925 至 1926 年的省港大罷工，國共兩黨採取激烈的罷工行動，並利用兩黨的資源來支持工人大規模罷工，結果歷時十六個月的罷工行動嚴重影響了香港的經濟活動。

和一般的罷工運動不同，省港大罷工是由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共同策動，而二十多萬香港工人都參與其中。省港大罷工的發生與結束也不是因為偶然性，而是與當時中國政局、國共兩黨之間的合作和互動，有緊密的關係。

在罷工初期，國共兩黨的目標都視罷工為與帝國主義鬥爭的工具。然而，國民黨內部因左派的廖仲愷被暗殺激化黨內派系鬥爭，令事態出現轉節及變化。隨著蔣介石的掌權，省港大罷工的方向亦出現了轉折。蔣介石想盡早結束罷工以集中力量進行北伐。在共產國際不表反對下，省港大罷工便因此結束。香港華人在

罷工行動中展現的愛國行為，也告一段落。參與罷工的香港華人只能接受罷工結束的現實，無力再持續他們的愛國行為。

省港大罷工的從開始到結束，顯示中國內部國共兩黨影響並主導著他們愛國行為的方式及規模。五卅慘案引發的香港華人愛國行為，如果沒有國共兩黨的策劃組織，只依靠香港華人去進行愛國行為，它的規模及持續性相信不會像省港大罷工般大型及持久。1919年香港市民響應五四事件的行為中，可見香港華人發起的愛國行為未必能持續，規模也是有限。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主要是一次以經濟因素為主導的工業行動，愛國行為只算次要。香港華人在省港大罷工中展現的愛國行為，基本上是國共兩黨主導所致。國共兩黨之間的互動亦影響省港大罷工的開始與結束，及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的方向性及持續性。

### 6.3 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的組織性

1919年香港華人響應五四事件的愛國行為是缺乏組織性的，而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主要是由海員工會所發動，而其他行業的工人則陸續加入罷工行列。省港大罷工則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發動的有組織及大規模的罷工行為。共產主義所主張的反帝國主義思想，將香港市民的愛國行為激發成大規模的罷工行為，目的在於令香港蒙受經濟上的損失。

省港大罷工是有組織的。罷工委員會在整個行動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罷工委員會之上有罷工工人代表會議，之下則設有幹事局等部，另設財政委員會等行政機構。不論從策劃、執行、宣傳、資源調度上，罷工委員會都起著積極作用，令整個罷工運動有組織地進行。國共兩黨都在罷工行動投入龐大資源。

根據當時在香港積極籌劃罷工行動的鄧中夏的說法，更可以證明省港大罷工

中部份華人的愛國行為動機並不完全純正。鄧中夏在香港積極籌劃罷工過程中，發現香港當時雖有百多個工會，但並不統一，有不少更是與資方妥協或被收買的所謂「黃色工會」。<sup>156</sup>這些「黃色工會」領袖贊成罷工，因為罷工對他們並無不利，罷工後他們仍握有領袖權，一方面可以取得愛國虛榮，另一方面可以剋扣得來的罷工經費。<sup>157</sup>鄧中夏等人在香港與這些「黃色工會」領袖談判時是清楚這點的，但為了要在香港實現罷工，所以對他們採取容忍態度。<sup>158</sup>因此，省港大罷工的香港華人愛國行為是通過罷工委員會聯繫香港的工會所發動的行為。

正如香港政府所理解，省港大罷工不是一個純粹的罷工行為。在多次的定例局會議上，在任的港督都表達了這種觀點。港督司徒拔認為省港大罷工不是罷工行動，因為罷工的目的往往是工人需要解決困苦，而要求得到討論及解決，但省港大罷工的工人並沒有解決困苦的訴求，而是藉罷工去對抗法律和社會秩序。<sup>159</sup>他又認為省港大罷工是由香港以外的機關發動的，藉同情中國上海及其他地方因事受難的中國人，進行以罷工為名的攻擊。<sup>160</sup>繼司徒拔成為港督的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 1875 – 1947，1925 – 1930 在任）認為省港大罷工是香港工人因為反英而進行的杯葛行為，無關工人的經濟生活。<sup>161</sup>他認為省港大罷工是由布爾什維克思想所煽動的反英杯葛行為。<sup>162</sup>可見從省港大罷工所表現的愛國行為，是由國共兩黨支配。香港華人是參與者，而不是策劃者。1919 至 1926 年間的香港華人愛國行為，正是由缺乏團體策劃過渡到愈來愈有組織性，而國共兩黨的參與是其主要原因。

---

156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 - 1926）》，頁 222。

157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 - 1926）》，頁 223 - 224。

158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 - 1926）》，頁 224。

159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Records* (23 June 1825)

160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Records* (9 July 1825)

161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Records* (4 February 1826)

162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Records* (15 October 1826)

## 6.4 香港華人愛國行為與華人精英

1917 至 1926 年間的愛國行為的參與者主要是一些學生及市民，海員大罷工及省港大罷工中的參與者主要是工人。華人精英並沒有領導愛國行為。作為華人的領袖階層，他們對罷工行動是有保留的。華人精英在香港的利益與香港的經濟息息相關。香港的經濟受損，必然影響華人精英特別是華商的既得利益。香港華人精英與一般市民之間存在著不同利益，而部份華人精英包括周壽臣（1861 - 1959）在省港大罷工的表現，更獲得港督的讚賞。他們積極地聯絡工人，制衡罷工工人的激烈行動。周壽臣更在 1926 年獲金文泰港督委任為行政局議員，是香港華人的第一人。如前文所述，香港華人雖然作為一個群體，但華人之間並不一定有共同目標的愛國行為，甚至是存在著不同的效忠對象。無可否認，以華商為主的華人精英在愛國行為上的取態，對愛國行為本身的效果是有一定的影響力。如果他們積極參與愛國行為，將會令香港政府面對更大的群眾壓力。因此，香港政府一直希望與華人精英維持良好關係，並給予政治權利以籠絡他們，便是希望爭取他們對殖民地政府統治上的支持。

相反，對一般市民來說，愛國行為不過是基於對中國的民族感情及愛國情緒，表達他們對國內發生的事件的方式。香港的華人雖然身處於中國邊緣的殖民地，但他們並不一定以香港為永久居所，他們對國內事件關心是不難理解的。至於華人精英，他們在重大事件上，往往要考慮自己的利益及前途，來決定他們是否要利用愛國行為來支持國內的行動，或表達民族及愛國主義情緒。從 1919 至 1926 年的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中，可見華人愛國行為不一定得到華人精英的支持，特別是罷工行動。當海員大罷工及省港大罷工的情況對香港經濟出現負面的影響時，華人精英甚至會反對這些愛國行為，並支持香港政府，要求這些行為早日結束。

在海員大罷工及省港大罷工中，不少華人精英如前文所述的周壽臣等都是站



在香港政府的一方，部份更嘗試對罷工進行調解，但並不成功。這正好反映華人精英與一般市民在利益上的衝突。一般華人在香港的愛國行為未必被華人精英所認同，而華人精英的行為亦不一定得到一般市民的支持。

## 6.5 小結

本章以 1919 年至 1926 年間的香港華人愛國行為作為一個特定的時段來分析。香港的邊緣位置，顯現它與中國的關係的獨特性。在中國發生因民族及愛國主義而激發的事件會對香港華人的愛國情感有影響力，但事件的強度對地理上處於中國南方邊緣的香港卻會較弱。資訊的傳播畢竟隨地區遠近而有所不同，例如報章的報導也不能即日將中國國內發生的事件傳送到香港，這自然會影響香港華人對中國內地事件的敏感度。再者，香港始終是英國殖民地，華人社群並不團結，愛國行為的強度畢竟有限。

在 1919 年至 1926 年間，中國政局的發展對香港華人在該時段內的愛國行為有重大的影響，其中五四事件、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國共合作、五卅慘案等等，令本來沒有積極性、沒有組織性、較溫和的香港華人愛國行為受外在環境影響而演變為有組織的激烈行動。中國國內的愛國事件當然是激發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的原因之一，而國共兩黨主導了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的方向及規模，策動省港大罷工這種有組織性的愛國行為，對香港社會影響甚大。



## 第七章 總結

外在環境與內在環境均對 1919 年至 1926 年間的香港華人愛國行為產生影響。由於香港華人是以移民人口為主，香港華人對中國及中國人民會有一定的關心。因此，中國國內的事件牽動香港華人的愛國情緒並不稀奇。在地理上，香港處於中國邊緣；在政治上，香港是英國殖民地。1919 年香港華人響應五四事件的愛國行為，相比其他中國城市的華人，是表現得較不積極，亦不算激烈。這可歸因於香港在中國地理上的邊緣性，比中國其他城市，較少受國內的政治局勢所影響。此外，在香港政府的管治下，香港華人群體並不完全團結。由於一般市民的利益與華人精英利益之間有明顯的衝突，香港華人難有目標一致的愛國行為。從 1919 年香港華人響應五四事件的愛國行為中，正反映出一種沒有組織性，沒有領導的愛國行為模式。

在中國國內自 1919 年五四事件激發出中國人民強烈的愛國情緒，在 1920 年代繼續形成風潮，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思想，均對中國人民的愛國情緒產生強化作用。孫中山與蘇俄的友善關係，更促成國共合作，反帝國主義思想令愛國行為表現得更激烈。

1919 年至 1926 年間，隨著中國政局不斷演變，而香港的華人愛國行為亦愈受中國國內國共兩黨的合作與互動所影響。不團結的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力量本來是有限的，但國共兩黨的策劃及參與令愛國行為變得有組織性，在行動上變得更激烈。

因為中國國內五卅慘案的爆發，令國共兩黨有機會共同進行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並主導了香港華人作出響應的愛國行為。省港大罷工是香港華人回應中國國內事件的愛國行為的高潮。省港大罷工的規模及組織性並非單憑香港華人便

能夠進行。香港華人在省港大罷工中的愛國行為的激烈程度甚至對香港的經濟造成嚴重破壞，並對殖民地政權產生威脅。然而，省港大罷工的終結，亦與國共兩黨在中國國內的互動有莫大關係。當國民黨左派核心成員廖仲愷被暗殺後，黨內左右兩派發生內鬥，直至蔣介石掌握國民黨權力後，北伐成為了國共兩黨的新目標。省港大罷工因此步入尾聲，香港華人在罷工所表現的愛國行為亦隨國共兩黨的新方向而衰落。

1919 年到 1926 年間的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主要是受中國國內發生的愛國事件所激發，並且愈益受國共兩黨所主導，同時變得更有組織性，因此它的激烈程度及破壞力亦愈強。外在環境始終都比內在環境扮演著較重要的角色，影響著香港華人的愛國行為。

## 參考書目

### 甲：中文書籍

- 上海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卅運動史料》第一、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編：《共產國際、聯共(布)秘檔與中國革命史新論》（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80年）。
- 王建初、孫茂生主編：《中國工人運動史》（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
-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年）。
-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2017年）。
- 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 - 1949）》（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1年）。
- 沙東迅：《五四運動在廣東》（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
- 李玉貞：《孫中山與共產國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
- 何佩然（編著）：《源與流——東華醫院的創立與演進》（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
- 林忠佳、張添喜主編：《《申報》廣東資料選輯・九(1914.1 - 1919.12)》（廣東：廣東省檔案館《申報》廣東資料選輯編輯組，1995年）。
- 周策縱著，楊默夫譯：《五四運動史》（台北：龍田出版社，1980年）。
- 香港海員工會：《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香港：香港海員工會，2013年）。
- 夏其龍著，蔡迪雲譯：《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香港：三聯書店，2014年）。
- 梁寶霖、梁寶龍、陳明鈺、高彥頤合編：《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香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1982年）。
- 梁寶龍：《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香港：中華書局，2017年）。
- 陸恭惠：《地下陣線》（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1年）。
- 郭恒鈺：《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台北：東大圖書，1989年）。
- 陳明鈺主編，梁寶霖、梁寶龍、趙永佳、陸鳳娥合編：《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香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1986年）。
- 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
- 陳福霖：《廖仲愷年譜》（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

-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香港：中華書局，2014 年）。
- 彭明：《五四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 程美寶、趙雨樂合編：《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香港：香港公開大學，1999 年）。
- 黃修榮：《國共關係史》，上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 年）。
-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年）。
- 蔡思行：《香港史 100 件大事（上）》（香港：中華書局，2012 年）。
-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年）。
- 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新竹：商務印書館，2016 年）。
- 廣東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省港大罷工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 年）。
- 廣東省地方史誌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志大事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
- 盧權、禰倩紅：《省港大罷工史》〔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
- 羅志平：《民族主義與當代社會：民族主義研究論文集》（台北：獨立作家，2016 年）。
- 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年）。
- 〈澳大利亞〉顏清湟著，栗明鮮、夏躍夫譯，姚楠校訂：《出國華工與清朝官員》（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90）。

## 乙：中文論文

- 丁新豹：〈歷史的轉折：殖民地體系的建立和演進〉，載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第三章（香港：三聯書店，2017 年），頁 67 - 144。
- 丁新豹：〈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1841-1870）〉（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論文，1988 年）。
-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載余英時等著：《五四運動：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頁 1 - 31。
- 吳倫霓霞：〈香港對武昌革命的反應及與粵軍政府的關係〉，載程美寶、趙雨樂〔合編〕：《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香港：香港公開大學，1999 年），頁 139 - 152。
- 李曉勇：〈國民黨與省港罷工〉，載《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四期，頁 232 - 242。
- 洪溫臨：〈省港大罷工初期的粵港關係(1925 年 6 月—10 月)〉，載《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究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 年），頁 323 - 365。
- 陳君葆：〈四十年的回憶 - 寫於五四運動四十週年〉，載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文集》〔香港：三聯書店，2008 年〕，頁 383 - 384。

- 陳君葆：〈紀念五四在今天〉，載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文集》〔香港：三聯書店，2008 年〕，頁 206 - 207。
- 陳國球：〈香港的五四和香港的中國〉，載洪清田主編：《人文香港：香港發展經驗的全新總結》（香港：中華書局，2012 年），頁 63 - 77。
- 陳學然：〈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初期發展：以《華字日報》為中心的考察〉，載陳平原、陳國球、王德威編：《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0 - 27。
- 陳謙：〈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合編：《廣東文史資料 - 第 24 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 年），頁 40 - 45。

### 丙：中文網上資源

《華字日報》，收於香港公共圖書館 《多媒體資訊系統》。

### 丁：英文書籍

- Carroll, John M.,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Carroll, John M.,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Chan, W. K.,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Faure, David (ed.), *Hong Kong: A Reader in Society History* (Hong Kong: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Faure, David (ed.), *Society: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 Ho Pui-yin, *The Administrative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gencies, 1841–200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Jarman, R. L. (ed.), *China: Political Reports 1911- 1960 Volume 1 1911 - 1921* (England: Archive Editions, 2001).
- Law, Wing Sang,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Michener, Roger, *Nationality,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St. Paul: Professors World Peace Academy, 1993).
- Munn, Christopher, *Anglo-China –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 – 1880* (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1).

- North, Robert C,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Ozinga, James R, *Communism: The Story of the idea and its implementati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1).
- Primoratz, Igor and Pavkovic, Aleksandar (Eds), *Patriotism: Philisoph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Aldershot: Ashgate, 2007).
- Sinn, Elizabeth,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 Taylor, Jay,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c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Tsai, Jung-Fang,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Wilbur, C. Martin,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Wilbur, C. Mart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戊：英文論文

- Chan, Ming K, "Hong Kong in Sino-British Conflict: Mass Mobilization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1912 - 1926" in Chan, Ming K (ed.)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Young, John 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 - 199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7 – 57.
- Tsai, Jung-fang, "From Anti-foreignism to Popular Nationalism: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in Chan, Ming K (ed.)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Young, John 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 - 199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9 - 25.

#### 己：英文網上資源

- 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 HKU Libraries, <http://oelawhk.lib.hku.hk/exhibits/show/oelawhk/home>
-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Records, *website of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KSAR*, [http://www.legco.gov.hk/yr97-98/english/former/lc\\_sitg.htm](http://www.legco.gov.hk/yr97-98/english/former/lc_sitg.htm)
- Reports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1911, 1921, 1931), *Hong Kong Government Reports Online (1842 – 1941)*, HKU Libraries, <http://sunzi.lib.hku.hk/hkgro/index.jsp>